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 朱天飏 | 执行主编 曹海军 刘骥

ROBERT H. BATES

[美] 罗伯特·H. 贝茨 著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 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

曹海军 唐吉洪 译 | 刘 骥 刘秀汀 校

ROBERT H. BATES

[美] 罗伯特·H. 贝茨 著

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 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

曹海军 唐吉洪 译 | 刘 骥 刘秀汀 校

© 2005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9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 /
(美) 贝茨著；曹海军，唐吉洪译. — 长春：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2
(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ISBN 978-7-5463-4635-9

I. ①热… II. ①贝… ②曹… ③唐… III. ①农业政
策 - 研究 - 非洲 IV. ①F34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1183号

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

-
- 著 者 [美] 罗伯特·H. 贝茨
译 者 曹海军 唐吉洪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463-4635-9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 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 2006 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 1965 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

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

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注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 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础。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

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视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据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

实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序 言

欠发达即意味着贫穷。农业也是如此。《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代表了一种通过分析农业社会的政治来理解发展经济学的努力。

本书也论述了非洲的发展问题。在准备写作本书期间,我游历了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尼日利亚以及赞比亚,在当地我对政策文件做了笔记摘录,并认真研读了政府报告和系列报刊,收集了主要农业市场的价格数据。我也走访过部长和农民,并从山巴^①游历到各个港口城市,以努力追踪主要农业商品的市场链。

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发现曾经为独立而欢呼雀跃的乐观精神正在幻灭。在我着手这项研究时,当地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平均 2% 多下降到几乎 0%; 而到本书付梓出版之时,当地的经济已经开始转为负增长。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的 46 个国家在 1970 年时尚有 20% 拥有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就只有 7% 了。现在那里遍布的是威权主义政体,有些伪装成一党体制,而其他的显然是独裁体制。

ix

在论述非洲衰落的根源时,我作了两项使本书独具特色的决定。第一个是假定农场主(乃至农民)会对经济激励作出回应。我之所以愿

^① shambas 是东非地区对一块耕地的称呼。——译者注

意作这项假定是因为我曾在这些村庄居住过,我知道这是实情。第二个决定是,非洲各国政府可以采取塑造这些激励,从而对本国的经济绩效产生重大影响。第一个决定引导我转向了政治学中日益为人所知的理性选择学派。后一项决定则将我的注意力从关注非洲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转向它们内部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影响。由此,我脱离了当时的主流范式,即所谓的依附发展学派。

研究路径

回想起来,我现在才认识到,聚焦于发展的国内因素而不是国际因素这个决定是何等的激进。在我探索欠发达的国内根源产生的影响之时,全球性的力量正从外部施加强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美元贬值和俄罗斯进入全球粮食市场的刺激下,全球各个市场的粮食价格迅速攀升。厄尔尼诺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疯狂肆虐,这一方面抬升了北美的谷物出口价格,另一方面则造成了非洲同期的干旱;由此,在全球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同时,非洲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在迅速攀升。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石油价格的剧烈震荡和利率的上升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这导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对非洲农业出口品的需求量减少。

x 假使我早将这些影响力量考虑在内,我仍然不会放弃去考察非洲政策选择的内部决定因素。但我将会提出不同的问题。认识到外部冲击的严重程度,我将会提出下列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政府对此会作出这样的或不作出这样的回应?为什么它们没有在美元贬值时调整它们的汇率?为什么当相对于资本的机会成本而言投资回报率已经大幅下降时,它们仍然继续投资国内没有收益的产业呢?为什么它们将绝大部分减少的出口收益转嫁给农民,而不是更多地去承担源自国外市场的风险?还有,在回应这些冲击的过程中,为什么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经济体而言,非洲经济体会如此深陷其中、饱受其苦?

公众的反应

由于强调政府政策的经济成本,《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与同时代的意识形态争论形成了共鸣。里根主义经济政策(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支持者看到本书为他们的下述信念作了辩护,即政府是问题而非方法的一部分。世界银行在1981年发布了著名的《博格报告》(*Berg Report*),同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书——《市场与国家》,两篇文献相得益彰、增进了彼此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数据确认了我所描述的市场干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对生产者激励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市场与国家》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府会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干预。该报告呼吁削弱政府的作用,这标志着里根—撒切尔主义思想已对发展机构造成影响——而且,我恐怕拙著也已融入现在正在形成的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著称的正统学说。

更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反应,其内部构成正在逐步分化。在巴西和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之前,依附理论家占据统治地位。该学派的成员曾直言坚持,“南方”的欠发达是由“北方”在全球市场中的支配地位造成的。他们声称,国际剥削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

对于这种分析,相信资本主义可以并且能够改变所有社会的这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的不同意见。他们的立场暗含的意思是,阶级的形成和阶级冲突无处不在,即便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市场与国家》似乎确认了他们有关发展中世界存在内部不平等模式的看法,而且本书也为剥削的发生机制提供了真知灼见。非洲的发展危机就这样成了欠发达的标志,因为非洲的政治领导人将资源从生产性的投资转向精英的私人消费。

学术界的反应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这方面持续喧闹的争论也归于沉寂。然而,《市场与国家》仍继续被用于学术课程,这大部分是因为本书发展了一种推理模式,也就是现在政治学研究中著名的“理性选择”路径。

本人在该领域的研究经历将我引向了这一研究路径。我发现,曾与我共同生活过的村民们是精明的策略家。他们自信满满而非恭敬顺从,他们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有惊人的了解,而且对自身利益有充分的认识。只是在某一个相关方面他们与我们这些发达世界的人们不同:自然给他们发了一手糟糕的牌。在认识到这一现实后,我放弃了自己做研究生时钻研的研究路径——强调文化和依赖心理学的现代化学派,并转向了基于理性假定和选择重要性的理论形式。

一被引入发展研究,理性选择学派就遭到了抨击,因为它明显在伦理道德上赞成通过竞争性市场实现配置。公共选择传统的追随者当然赞同这一立场,并且有些人还将《市场与国家》归入这一学派。然而,在《市场与国家》一书中,我将市场配置作为基准,是用以推导政治力量的影响而不是判断结果具有何种道德特质。我也强调了这一明显的事实:相较于政府而言,竞争性市场将为非洲农民提供更高的农产品价格。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赞同市场并不意味着认同效率高于公平,也并不意味着在判断福利水平时可以忽视分配。

虽然我寻求利用市场理论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推理工具并设法维护农民的利益,但我首要的关注点仍然是政府的选择以及塑造了非洲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的政治激励。

由于波普金(Popkin 1979)、斯科特(Scott 1976)以及其他人所作贡献的影响,理性选择研究路径已经跃出了经济学边界并稳固了其在发展研究中的地位。尤其在政治学领域中,理性选择的研究路径已经在

知识界赢得了显著地位；它们被用于研究 20 世纪后期债务危机期间的政策变迁，分析新兴民主国家中的选举分歧(electoral cleavages)和立法行为，以及阐释政府管理贸易开放风险的方式。渐渐地，学者们运用这种研究路径时就把它当成了一种实证调查的模式而非道德推理的形式，一种调查和阐释的途径而非创立一般性法则(law-like generalities)的方式，一种归纳的工具而非演绎的方法。由于非合作博弈论(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被广泛地吸收进社会科学，那些运用该研究路径的研究者，现在可以将他们的分析建立在与市场理论存在分歧乃至事实上严重对立的知识传统之上。理性选择的研究路径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提出和解决重大问题的途径。

如果政治家是理性的，为什么他们会作出有违社会利益的非理性选择？如果他们是理性的，为何他们会做出损害集体福利的行为？这些就是《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一书提出的核心问题。时至今日，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一如本书首次出版之时。

结 论

非洲在发展问题上给我们的时代提出了挑战。非洲的经济体依然贫穷。而且非洲的政治特质对非洲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具有不利影响。我们这些学者必须继续探寻非洲正试图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这是有关发展的政治基础的经验教训。由于非洲带给我们的挑战，它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感知我们周遭世界的方式。

剑桥，马萨诸塞

2004 年 8 月

xiii

致 谢

笔者的研究得到了非洲和美国诸多个人和组织的支持。

谨向本人在加纳期间给我提供协助的下列组织表示由衷的感谢：加纳大学农业经济与农场管理系；统计、社会与经济研究所；农业部；农业开发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可可产业部。我还要特别感谢迈克尔(Michael)和玛丽·沃伦(Mary Warren)以及伊曼纽尔·安德(Emmanuel Andah)教授的协助和盛情。

我要向本人在尼日利亚期间下列机构给予我的帮助致以深深的谢意：洛克菲勒基金会；热带非洲研究院与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尤其是该大学的政治学系、农业经济学系以及社会与经济研究所。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人在尼日利亚研究期间泰勒·比格斯(Tyler Biggs)教授给我提供的协助。埃隆·吉尔伯特(Elon Gilbert)和萨姆森·奥雷迪(Samson Olayidi)提供的诸多建议对我在尼日利亚研究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至关重要。

在肯尼亚研究期间给本人提供帮助的下列机构，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福特基金会；发展研究院；内罗毕大学政法系；农业部规划署；农业部图书馆；中央统计局以及国家档案馆。我还要特别感谢苏珊娜·德劳(Suzanne Drouilh)的悉心指导。另外，我要对下列几位人士表示感谢：拉斐尔·卡普林斯基(Raphael Kaplinsky)、蒂莫西·奥尔丁顿

(Timothy Aldington)、埃德加·温南思(Edgar Winnans)以及珍妮弗·夏普利(Jennifer Sharpley)。还有戴维·布罗肯沙(David Brokensha)给予的帮助对我在肯尼亚的研究也颇有助益。

在坦桑尼亚期间,农业部市场研究所给予了我慷慨的帮助和支持。我要特别感谢斯蒂芬·隆巴德(Stephen Lombard)给予的援助和鼓励。

我也要感谢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咖啡组织和国际可可组织给予我的工作上的协助。

在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本人就已开始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所以在此我想要感谢沃尔特·福尔肯(Walter Falcon)主任以及该研究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并特别感谢其中的几位非洲问题专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布鲁斯·约翰斯顿(Bruce Johnston)和斯科特·皮尔森(Scott Pearson)。我还要感谢本人在斯坦福大学期间社会科学委员会以及加州理工大学提供的工作上的支持。

1978年春季的那段日子使我对该课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迈克尔·劳福齐(Michael Lofchie)与我一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非洲研究中心开办了非洲农业发展的研讨班。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那次研讨班的所有参与者,尤其是迈克尔·劳福齐,大家都坦诚相见、互享知识成果、相互批评和相互鼓励。

拙作还得到了加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我要特别感谢马西亚·纳尔逊(Marcia Nelson)和乔·阿扎里(Jo Azary)帮我整理了手稿;感谢芒格非洲图书馆(Munger Africana Library)的协助,特别是米利肯图书馆(Millikan Library)馆际互借部提供的既专业又令人愉快的帮助。同时,我也要感谢莱斯利·马登(Leslie Madden)、马克·格兰杰(Mark Granger),特别是米里亚姆·艾希瓦尔德(Miriam Eichwald)的研究助理工作。威廉·罗杰森(William Rogerson)和肯尼思·麦克库(Kenneth McCue)在本人论点的诸多关

键处启发和磨砺了我的思维。

我还从下列组织和研讨班的参与者那里得到了许多关于拙作的批判性补充意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非洲研究中心举办的专题研讨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政治学会 1979 年年会，以及维也纳经济大学城市与地区研究跨学科研究所。

下列诸位的评论与批评对于手稿的完成同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戴维·阿伯内西 (David Abernethy)、巴里·埃姆斯 (Barry Ames)、戈登·阿普尔比 (Gordon Appleby)、布莱恩·巴里 (Brian Barry)、布鲁斯·凯恩 (Bruce Cain)、卡尔·艾彻 (Carl Eicher)、约翰·费约翰 (John Ferejohn)、莫里斯·菲奥里纳 (Morris Fiorina)、埃隆·吉尔伯特 (Elon Gilbert)、速水佑次郎 (Yujiro Hayami)、弗朗西斯·希尔 (Frances Hill)、格兰·海登 (Goran Hyden)、布鲁斯·约翰斯顿 (Bruce Johnston)、威廉·琼斯 (William Jones)、马文·米拉克莱 (Marvin Miracle)、加里·米勒 (Gary Miller)、罗杰·诺尔 (Roger Noll)、乔·奥本海默 (Joe Oppenheimer)、塞缪尔·波普金 (Samuel Popkin)、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塞耶·斯卡德 (Thayer Scudder)、艾伦·斯威齐 (Alan Sweezy)、朱迪思·滕德勒 (Judith Tandler)、戈登·塔洛克 (Gordon Tullock)，以及两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读。我还要特别感谢塞缪尔·波普金的鼓励与批评。最后，我要感谢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 (批准号 SOC77-08573A1)。

xvii